

# Moment In Peking 之漢譯本研究

——以張振玉、郁飛譯本為中心

孔令雲

---

[提 要] 林語堂的英文長篇小說 *Moment In Peking* 自 1939 年在紐約出版後，國內有多種漢譯本面世，中文題名亦有《瞬息京華》和《京華煙雲》兩種譯法。不同譯者的節譯本、全譯本存在顯著差異，同一譯者前後的譯本亦有所變動。其中張振玉譯本、郁飛譯本為全譯本，且影響較大。張、郁譯本在技術性操作與意識形態操控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的翻譯風貌，從中亦體現出譯者的翻譯策略與文化觀。

[關鍵詞] *Moment In Peking* 《京華煙雲》《瞬息京華》漢譯本 校評

[中圖分類號] H059;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3-0067-11

---

林語堂先生的英文長篇小說 *Moment In Peking*<sup>①</sup> 1939 年由紐約 The John Day Company 出版，立即引起廣泛關注。《時代》周刊發表書評稱其“很可能是現代中國小說之經典之作”，“這部小說的成功，奠定了林語堂作為小說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sup>②</sup> 這部小說陸續被翻譯成包括漢語在內的多種文字。僅就漢譯本而言，不同譯者的節譯本、全譯本存在差異，甚至同一譯者前後的譯本亦有所不同。本文以 1939 年英文版 *Moment In Peking* 為底本，以張振玉 1987 年、1994 年譯本和郁飛譯本為中心，分析幾種漢譯本特色，並進一步探尋譯者的翻譯策略與文化觀。

## 一、*Moment In Peking* 之漢譯版本概述

林語堂曾自言英文小說 *Moment In Peking* 為“紀念全國在前線為國犧牲之勇男兒”<sup>③</sup> 而作。他期望好友郁達夫翻譯此作，以早日讓抗戰中的同胞讀到中譯本。然而，諸多原因使這一特許全譯本未能譯成，殊為文壇憾事。迄今為止，已有白林、沈沉、汎思、越裔、林若年、楊和堦等中文節譯本、譯述本，鄭陀、郁飛、張振玉之全譯本。1940 年代，羅明還將《京華煙雲》改編為話劇，分期發表在《小說月報》。<sup>④</sup> 此外，還有幾部私印本、盜印本問世，影戲界也曾計劃把《京華煙雲》搬上銀幕與舞台。<sup>⑤</sup> 許多讀者亦紛紛發文對中英文版本予以評價。可見，該小說在當時產生了不小影響。

### (一) 漢語節譯本簡介

白林節譯本題名《瞬息京華》，北平東風書店 1940 年初版。這一譯名符合林語堂本意，他曾致

信友人，稱小說“似可譯為《瞬息京華》”。<sup>⑥</sup>卞之琳談到詩歌平仄問題時，亦認為“《瞬息京華》這個著者自譯的四字文言書名，是順口、順耳的，而改成《京華煙雲》這個四字文言譯書名就不然：這是因為前者是仄仄/平平，而後者是平平/平平”。<sup>⑦</sup>白林譯本有刪減，注重譯述故事情節，故難體現原作風貌。該譯本流傳不廣，如今更難覓蹤跡。

沈沉譯述本亦名《瞬息京華》，1940年7月由上海世界文化社出版，翌年4月由上海歐風社再版。譯文分三卷，即“道家的女兒”、“園中的悲劇”、“秋日之歌”。每卷不分章節，卷前分別引《莊子》中《大宗師》、《齊物論》、《子(知)北遊》中的一段話。其他內容如著者序、人物表等省略未譯。沈譯本對丫鬟銀屏被姚家驅逐，孔立夫法庭受審，姚思庵、木蘭會見曹麗華等情節譯述細致，而中日事變後的情形及書中幾位重要人物的命運則譯述簡略，甚至以一兩段話概括。原作中豐富的民俗風情、故事背景，以及對塑造人物形象起重要作用的詩詞歌賦等，則基本省略未譯。姚木蘭寫給“第三者”曹麗華的信沒有直譯，由此，木蘭處理此事時的睿智、豁達、才情，譯文中無法充分地體現出來。不過，有些對聯及簽文，譯筆可謂精彩、準確，如，“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忙？”“假作真時真作假，香風一陣盡成空！”<sup>⑧</sup>“曲水繞山山繞水，閑人觀伶伶觀人！”<sup>⑨</sup>這些譯文對以後的幾種譯本有參考作用。在大後方，林若年譯述本亦名為《瞬息京華》，<sup>⑩</sup>在桂林等地出版。林譯本與沈沉譯述本鮮有差異，只是一些標點符號略有變化，林譯本將少數誤寫改正。

越裔譯述本題名《瞬息京華》，分上、中、下三集分別刊發於《世界傑作精華》期刊。<sup>⑪</sup>越裔僅節述正文部分，其他內容未譯。譯文不分章節，一些解釋性、議論性內容以及詩詞、信函等刪去未譯，且數字誤譯較多。不過，譯者古詩文修養可以從部分譯文中體現出來，如紅玉的遺信等。越裔在當時上海雜誌《天下事》上發表了大量譯作，還曾翻譯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sup>⑫</sup>，林氏評為“此譯不錯，引用中文無誤，又凡引用中文各段，附加英譯”。<sup>⑬</sup>越裔譯述本故事完整，較為關注歷史性、政治性事件。該譯文後附林語堂致周黎庵信函，以及周黎庵的長文《關於〈瞬息京華〉》。<sup>⑭</sup>周黎庵在此敘述了故事概況，探討作者的思想及著書的淵源，並用公式表示“《瞬息京華》=《紅樓夢》+莊子+其他”。越譯本還被收入大國書店出版的《縮小了的巨著》。<sup>⑮</sup>

此外，正氣書局發行的《瞬息京華》<sup>⑯</sup>，只注明著者，未注譯者，譯述正文內容，翻譯獻詞及三集的標題。該譯文前部分與越裔譯文幾近相同，但後部分有較大差別，主要表現為第三集突出抗戰內容，借木蘭之口喊出了抗戰必勝的心聲。結尾改譯為木蘭“想到國難家仇，不禁滿眶眼淚，只聽得那‘還我河山’的歌聲又在遠地裡悠揚激昂地唱着”。<sup>⑰</sup>很顯然，正氣書局譯本增強了抗戰意識，在日寇侵略的環境下，譯者的勇氣難能可貴。在“節述後言”中，譯者強調原作“對於此次中日戰事上替中國的宣傳也很努力”，讓人讀後“了然中國的苦衷，和不能再不抵抗的理由”。在藝術方面，譯者認為小說結構安排與材料選取“也很巧妙”。同樣，由於其譯述性質，該譯文無法充分體現原作藝術神韻。

汎思翻譯的《瞬息京華》在加拿大出版的《華僑評論月刊》連載，只譯了原作第一章及第二章開始部分。<sup>⑱</sup>譯本省略獻詞、人物表、目錄、正文前的引文等內容。該譯文採用中國傳統小說形式，語言文白相雜，有時顯得過於晦澀。值得稱道的是，汎思譯本京話嫻熟。期刊編者稱贊汎思：“對北平話下一般苦工，故於書中人的對話，神態身份，描摹盡致，譯風別具一格。”<sup>⑲</sup>此評當不為過。

總之，1940年代的節譯本譯者多為作家兼翻譯家，故譯筆尚流暢，只是其譯述、節譯性質，難以忠實地再現原文，殊為遺憾。這種節譯方式，林語堂不贊成，認為“在作者是一種損害”。<sup>⑳</sup>而譯者也表明這種翻譯方法的不得已：“惟因環境所限，不克依原文直譯，殊感遺憾啊！”<sup>㉑</sup>譯者自知“不能將

原書的精神充分的表顯述者的意思”，<sup>22</sup>大有嚴復翻譯《天演論》“譯例言”中申明的“我罪我知”的意味。

1940年代, *Moment In Peking* 沒有令林語堂滿意的譯本問世,原因是多方面的。譯者的文化修養,戰時惡劣的翻譯環境,譯述、編譯等翻譯方式,以及譯者急切地想讓漢譯本早日問世以鼓舞抗日,這些都影響了譯本質量。鄭陀在“譯後記”中談到譯者的心聲與艱難處境,<sup>23</sup>完善的全譯本難以問世。

## (二)漢語全譯本簡介

*Moment In Peking* 第一種全譯本為鄭陀、應元傑合譯的《瞬息京華》,1941年1月由上海春秋社出版部出版,分上、中、下三冊,分別名為《道家的女兒》、《庭園的悲劇》、《秋之歌》,書後附有林如斯《關於〈京華煙雲〉》一文。1946年1月,該譯本由上海光明書局重排出版,迄1948年4月,共出四版。<sup>24</sup>林語堂詳細校評過該譯本,指出譯名“不失原意”,譯文“瑕瑜共見”,有幾段“令作者滿意”<sup>25</sup>。鄭譯本人名、地名等誤譯之處甚多,譯文有“佶偃聲牙的巨句子”,句法“冗長”,未能用純粹白話寫人物對話。林語堂總評為“譯文平平,惜未諳北京口語,又兼時行惡習……,書中人物那種南腔北調的現代話,總不免失真”。<sup>26</sup>

抗戰勝利後,光明書局出版鄭、應譯本,香港、台灣亦多次再版,但多數並未注出譯者。該譯本在當時流傳甚廣。郁飛曾談到,在1940年代的新加坡、重慶、上海見到的全譯本都是鄭、應譯本。<sup>27</sup>馮亦代也曾提到他在抗戰末期的重慶見過該譯本。<sup>28</sup>鄭、應譯本雖不完善,但“是比較忠實的一個譯本,富有史料價值和閱讀價值”。<sup>29</sup>在搶譯、濫譯、節譯之風盛行的時代,作為第一個全譯本,對於再現原作及抗戰宣傳,都有積極意義。

第二個全譯本於1977年在台灣問世,由德華出版社出版。<sup>30</sup>譯者張振玉為台灣大學教授,也是著名翻譯家與翻譯理論家,曾翻譯多部林語堂作品。譯文初版本因“倉促付印,校對有欠精確”,存有不少誤譯、誤植等現象。當然,也有出於政治原因的改譯現象。1987年,時代文藝出版社以此為底本出版,大量誤譯、漏譯等內容亦未訂正,僅“個別文字作了修訂”,而這有限的修訂多為意識形態控制的結果。其後,張譯本多次在大陸再版。寫於1988年的“譯者序”中,張振玉詳細列出再版本修訂內容。<sup>31</sup>張譯本在大陸流行廣泛,已成為譯界與讀者公認譯本。

1991年,郁達夫之子郁飛翻譯《瞬息京華》,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sup>32</sup>在林語堂心中,郁達夫是最合適的翻譯人選,符合他在《論翻譯》中對譯者的三條要求。<sup>33</sup>郁達夫當時已經出版了四五部譯著,創作方面更是文名遠播,有廣泛的讀者群並熟知讀者的閱讀期待。此外,二人的翻譯觀也有相通之處。<sup>34</sup>從私人交情方面,“在當時作家中,與語堂往還最好的還是郁達夫”。<sup>35</sup>譯者與作者之間可隨時就翻譯問題交流意見。在原作尚未出版時,林語堂就委托郁達夫代為翻譯成中文。出版後,林語堂又將原著引用的人名、地名、古詩文及成語等,做了兩冊詳細注解,寄給郁達夫。<sup>36</sup>郁達夫也很重視老友委托的譯事,遺憾的是諸多原因導致譯文未能完成,只在新加坡《華僑周報》刊載部分譯文,<sup>37</sup>可惜今已無法查找。幾十年後,郁飛代父完成心願。郁飛譯文後附有“譯者後記”,林語堂的《關於〈瞬息京華——給郁達夫的信〉》、林語堂《談鄭譯〈瞬息京華〉》,郁達夫的《語及翻譯》(摘錄)、《談翻譯及其他》、《嘉陵江上傳書》及林如斯《關於〈瞬息京華〉》。這些譯介緣起、評論等內容,提供了豐富的背景材料,有助於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譯者及翻譯文本。

## 二、漢譯本譯校

張振玉譯本多次修訂,不同版本之間有較大變動,現選用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簡稱

張譯時代版)及《林語堂名著全集》之《京華煙雲》(以下簡稱張譯名著版),以1939年紐約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的英文本為底本(以下僅隨文標註頁碼),考察張振玉、郁飛譯本,兼論其他譯本。<sup>⑧</sup>

(一)譯者的技術性操作

張振玉譯文初版本與87版,誤譯、增譯、漏譯、改譯之處較多。此後,譯者多次修改,<sup>⑨</sup>但譯文中仍存在不少問題有待完善。

1.誤譯之處較多。

主要表現為時間、年齡等數字誤譯,此不一一列舉。此外,尚有用詞不當、句子結構混亂等翻譯現象。例如:

The diplomatic corps protested, but Kang Yi, sent to ‘investigate’ the Boxers,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sent from Heaven to drive out the Oceanic People and wipe out China’s shame’ and secretly let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m into the capital.(p.9)

外國使節團抗議,大臣剛毅派人去“調查”義和團的情形。結果回報說義和團是“上天派遣,驅逐洋人,洗雪國恥”。於是反倒暗中把千萬義和團放進了北京城。(張譯時代版,第6頁)

此句話應該是大臣剛毅被派去“調查”義和團的情形,而不是剛毅派人去“調查”。例如:

but he was too intelligent to approve of the Boxers, and was grateful that Lota and his brother Lotung had kept away from the rabble.(p.9)

他頭腦清楚,不附和義和團的無知胡行。他家僕人羅大與羅東兄弟避亂唯恐不遠,深以遇到這樣的主人為幸。(張譯時代版,第6頁)

此句話意為:他家僕人羅大與羅東兄弟避亂唯恐不遠,他深以有這樣的僕人為幸。

上述張譯文不當之處,郁飛譯文多已改正,但亦有少量誤譯之處。例如:

And his mother promised not to send Silverscreen away, if her family did not come to claim her.(p.215)

他母親答應,只要銀屏家裡不來贖就放她走。(郁譯,第203頁)

試譯:他母親答應,只要銀屏家裡不來贖就不打發她走。

又例如:

Actually, Lifu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his father-in-law. (p.455)

立夫實際不受到岳父姚思安的極大影響。(郁譯,第426頁)

試譯:實際上,立夫受他岳父極大影響。

此外,郁譯文有些句子過於拘泥於英文結構,使得譯文表達不順暢;相較而言,張譯文句子結構簡單,句意明晰。

例:Mulan’s threat of telling their father about what he had done might mean telling about slapping her, but it might mean much more, for there were many things that he had done that should not be told. (pp.76-77)

木蘭說來嚇唬人的什麼把他的行為告訴爸爸的話可以是打她耳光的事,也可能是許多別的情況,因為他做的見不得人的事太多了。(郁譯,第76頁)

木蘭威脅他說要把他做的事告訴父親,也許意思是把打她嘴巴的事告訴父親,也許並不止此,因為體仁還有別的事情也是不宜於讓父親知道的。(張譯時代版,第89頁)

## 2.增漏刪改

*Moment In Peking* 的預想讀者是外國人,林氏初衷是“把《京華煙雲》當作全面介紹中國社會的一扇大門,不熟悉中國國情的異域讀者從這扇大門裡伸頭探入中國社會,然後登堂入室”。其中涉及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如錦繡服飾、文明禮儀、社會風俗、中醫治療、哲學思想等知識,張、郁譯本基本都得以體現,同時也有增刪現象。

對於原作正文之前的“The characters”,“How to pronounce the names”,“Some Chinese terms of address”,這類稱謂及姓名拼讀等內容,各漢譯本均未譯出。此外,一些背景知識及解釋性、議論性知識,多數譯文選擇性翻譯或乾脆省略不譯。如,“third finger”,“Tsangfu”,“Cheng Panchiao”等,林語堂原文均有進一步的解釋,郁飛譯本未譯。對此,郁飛在譯者後記中指出,其譯本最大的特色是忠實於原著,“只刪去了純粹向英文讀者解釋中國事物的幾處,於完整性無損”。<sup>④</sup>原作與譯文所面對的讀者群不同,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對中國讀者而言,屬於常識性的東西,刪去並不影響原文的解讀,反而使結構簡練,故事更緊湊,可讀性加強。但是,在敘述故事中融入解釋性內容,恰恰是林語堂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時採用的翻譯策略之一,可以完整展現他輸出中國文化時的具體方式,有助於我們了解林語堂的翻譯觀。

張譯本增譯部分主要是“專名詞之補足”,即補充解釋文中的人名、地名、書名等。例如:

Lin, the translator of Conan Doyle and Sir Walter Scott, was the leader of the classical group. Ku, the old philosopher and mit and a whole-hearted supporter of oriental culture, was another...There were four leaders of the “Renaissance” Chen, Chien, Hu, and Liu.(p.502)

翻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案》與斯哥德《撒克遜劫後英雄傳》的林琴南,是舊派的領袖。老哲學家智者辜鴻銘,全心全力擁護東方文化,也是舊派中的健將。……新文學運動中四個領袖是陳獨秀,錢玄同,胡適,劉半農。(張譯名著版,第138頁)

原作中沒有具體書名《福爾摩斯偵探案》、《撒克遜劫後英雄傳》,新文學運動領袖也只提到四人的姓氏,張譯文補充完整,這是譯者有意為之。郁飛增譯的內容與張振玉譯文類似,多為補充知識性內容,這類增譯算不上語義過載。

## 3.原文替換。

不同語言體系的轉換中,要實現內容、音律、形式的完全對等是極其困難的,尤其是詩詞歌賦、繞口令、順口溜等文類。我們來看不同譯文是如何翻譯繞口令這一特殊文體的。例如:

A big dark dog met a bad black duck.

Now did the big dark dog bark at the bad black duck?

Or did the bad black duck peck at the big, dark dog? (p.253)

一只大黑狗遇上一只壞黑鴨。是大黑狗向壞黑鴨吠還是壞黑鴨啄那只大黑狗?(郁譯,第237頁)

一個大黑狗遇見一個壞黑鴨 還是大黑狗咬那個壞黑鴨 還是壞黑鴨啄那個大黑狗(張譯時代版,第257頁)

山前有個崔粗腿,山後有個粗腿催。二人山前來比腿。也不知崔粗腿的腿比粗腿催的腿粗,還是粗腿催的腿比崔粗腿的腿粗。(張譯名著版,第290頁)

這段繞口令,郁飛與張振玉87版都按照英文直譯。而張振玉在修改版中選取了與原文內容沒有任何關係的一段繞口令來替換。張振玉本人對此翻譯行為做過解釋,<sup>④</sup>這種替換行為能達到較

好的接受效果。其實,這種翻譯策略與林語堂本人的翻譯思想是有相通之處的。林語堂對特殊文體的翻譯處理如下:

Thus “drum” being the syllable common to “humdrum” and “drumstick”, the puzzle is given in the combination “hum-stick” and the other party is to supply the missing syllable.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 p.245)

這是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關於中國射覆遊戲的內容。意為:兩個單詞“humdrum”和“drumstick”共有一個“drum”音節,兩詞合成的“humstick”即為謎語,對方要補上省去的音節。譯者黃嘉德將之替換成如下漢語:“例如,注意‘酒’字,則言‘春’字及‘漿’字,使人射之,蓋言‘春酒’及‘酒漿’也。”<sup>④</sup>黃嘉德在序中指出,這是依林語堂之建議處理的。可見,張振玉和林語堂的翻譯策略都是以譯入語讀者為中心,注重接受效果而採取靈活翻譯方式。

#### 4.詩文、典故還原。

原作中有許多典故、詩文,翻譯時需要回譯原文,這方面郁飛譯本處理的最好,張振玉及其他譯本,有些地方沒有譯回原文。例如:

He casts his net mid-stream his haul to take, She drops her line and waits her catch to make; When all the day's catch is changed again for wine, They paddle the empty boat home in the showers' wake.(p. 367)

本詩是張君壽的《魚磯詩》,郁飛回譯原詩,張譯本自譯該詩,這種情況也表現在以下譯詩:

We are but passing guests from who knows where? Say not thy home is here, thy home is there. It suits me - what I've got and what I've not. The plum-flowers bloom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p.367)

此詩是明代詩人鄧青陽的《觀物吟》:“人生天地長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爭似區區隨所寓,年年處處看梅花。”郁飛譯回原詩(第343頁),張譯本、鄭譯本則根據英文意譯:

人本過客來無處 休說故里在何方 隨遇而安無不可 人間到處有花香(張譯名著版,第425頁)

誰知過客從何來 莫謂君家在那畔 故里若無還若有 李花到處有花開(鄭陀、應元傑譯,第410頁)

俞曲園的《別家人》一詩的翻譯情況與此類似。在詩歌的音律、審美方面,張、鄭譯文都達到與英文接近的效果,這也顯示了幾位譯者傳統文化修養較高,文字功底深厚。不過,原作是直接翻譯漢詩,漢譯文譯回原詩應是最合適的處理方式。

#### (二)意識形態操縱

幾部漢譯本的增刪改譯也與意識形態操控有關。政治文化語境決定了譯者採取何種翻譯策略,第四十五章的這段對話最為典型地體現出來。例如:

“That man is the coolest and the most stubborn I ever saw,” remarked Sunya. “He has done things that Chuko Liang (in the Three Kingdoms) could not do. He had the worst task any man ever undertook in this world, in uniting China. And now that he has done it, he is confronted with a still greater task, leading China to fight Japan. He is like a petrel that finds its natural element in a storm at sea—and perhaps enjoys it, too. He will carry the war to the end if anyone will. I have watched him for these last ten years. He is so gaunt and bony, but look at his mouth! His face shows the most curious combination of stubbornness and wiliness I've ever seen.”(1939: 778)

鄭陀、應元傑的譯文為:

“蔣先生這個人是我見過的人們中一個最冷靜和最堅決的人物。”新亞這樣說，“他替中國做了幾件事，是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所不能做的。他為了要使中國統一，曾擔任了世界上任何大人物所不曾擔任過的艱苦工作。現在他已經把這種統一的事業完成了，所以他要進一步去應付一種更重大的工作，就是領導中國去同 XX 作戰。蔣先生好象是一只海燕，喜歡在海洋的颶風駭浪當中去找玩意——也許他喜歡這種玩意。如果人民都願意的話，那麼他就會作到底。在過去十年中，我曾經注意他的種種行動。他這人是這樣的瘦削，而又這樣的怪骨嶙峋——但是你且看他的那張嘴，他臉上的表情是把堅決和深思混在一起的——這種表情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

鄭譯文中表達的是：蔣介石已經完成了統一中國這件事，現在面臨的抗戰，如果人民願意，他會作戰到底。鄭譯本基本表達了林語堂對蔣介石的看法。由於鄭譯本的出版於上海孤島環境，遂以“XX”替換“日本”等敏感詞彙。

孫亞說：“他這個人，在抗日的事情上，原來是消極的，畏首畏尾的。他是國民黨的領袖，是中央政府的首腦。他的消極態度不能不影響一大批黨國要人，這是令人遺憾的。西安事變將了他一軍，給了他一個深深的刺激，他應該變得積極了。全國同胞是這麼期望他的。只要他堅持抗日，他手下那些文官武將也就會堅持抗日。究竟他會不會使全國同胞失望呢？只有天知道。看着他的官邸我心緒茫茫。也許這是多餘的憂慮吧。果真如此，那就謝天謝地。我相信我的感情能夠代表很多同胞的感情。”（張譯時代版，第 824 頁）

這是 1987 年時代文藝出版社的譯文，與原文意蘊大相徑庭，譯文刻意掩蓋原作對蔣介石的由衷贊頌。林語堂曾在不同場合都表現出明顯的親蔣立場，在《新中國的誕生》中說蔣介石是“一位偉大的領袖，他的智慧及道德觀念，足以應付日本的侵略以及國共糾紛。”<sup>④3</sup>他回憶往事時也承認：“那時……我是唯一為蔣中正先生效力的。當時，我把喉嚨都喊啞了。”<sup>④4</sup>

此段譯文屬於改譯，主要是由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及其決定的出版環境決定的，非譯者個人所能左右。張振玉曾談到譯文初版本因政治原因，出版社將少量“禁忌字眼”予以刪除或“婉曲粉飾”。<sup>④5</sup>1987 年時代版所作的改譯亦多涉及政治內容。據出版者梅中泉回憶，當年提議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京華煙雲》時，報請吉林省委審定，並附上“激濁揚清的序跋”，結果有人利用當時的政治氣候，掀起大波瀾。國家新聞出版署請專家、學者對《京華煙雲》審讀後，方通知出版社可以發行。<sup>④6</sup>為了順利出版，出版社對譯文作適當調整是可以理解的。與此相印證的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於 1998 年出版英文版 *Moment In Peking* 時，則直接將上述段落中稱頌蔣介石的內容刪減，並刪除了有關義和團暴行的敘述。在“出版說明”中亦謹慎地指出：“《京華煙雲》或褒或貶地描寫了許多新派革新人物和民國特色人物，而又宣揚了莊周生死循環的達觀哲學，希望讀者能夠以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審慎明辨。”

此後，張振玉對譯文又進行了多次修改，包括評價蔣介石政治傾向的內容：

孫亞說：“他這個人，是我所見過的最冷靜而堅強不屈的人。別人做不了的事他都做成了。北伐戰爭這項空前艱巨的任務，他必須要擔當起來，他已經完成了。現在他又遭遇到更艱難的任務，要領導中國對抗日本。他已經習慣於在風暴裡幹自己的事，也許他以此為榮。他一定能夠把這場戰爭進行到底。過去這十年，我一直注意他。他削瘦硬挺而骨骼嶙峋，可是你看他的嘴！他的臉上顯出的堅強不屈與足智多謀，兩者配合得那麼神奇，我是從來沒見過的。（張譯名著版第 2 卷，第 459 頁）

孫亞說：“蔣先生是我所見過的人中一個最冷靜最倔強的人，他正想完成三國時代諸葛亮沒能完成的事業。統一中國這項艱難萬分的任務誰也沒能完成過。現在他又面臨領導中國抵抗日本這個更加重大的任務。他像在海上的風暴中的海燕——他或許也以此為樂，他會能夠抗戰到底的。我注意了他十年。這人瘦骨嶙峋，可是你看他那張嘴，他現在臉上表現出來的那種堅毅和深沉混在一起是我從沒見過的。”（郁譯，第 738 頁）

張譯文強調蔣介石的作為，“別人做不了的事他都完成了”。在時態上屬於過去完成時。而蔣介石領導抗戰也“一定能夠”進行到底，表達上用了肯定語氣；郁飛譯文中，蔣介石“正想完成三國時代諸葛亮沒能完成的事業”，“統一中國這項艱難萬分的任務誰也沒能完成過”，“他會能夠抗戰到底的”。這些譯句運用將來時態，否定、猜測語氣所表達的感情與內容，與原文顯然不符。很顯然，張、郁譯文通過選詞、時態、語氣、增刪等翻譯策略，體現出不同的政治表達：肯定/推測，完成時/將來時。由此，張譯文流露出對蔣介石的贊譽傾向，郁譯文則未過於褒貶。從漢譯時態及語氣中，兩部譯作表現出不同的政治傾向性。

漢譯本中還有一些內容出於政治原因省略不譯：例如：

Yuan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because Sun Yat-sen nobly but foolishly resigned in his favor. (p.347)

袁世凱做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因為孫中山先生把總統的職位讓給了他。這雖然是高風亮節，但是也未免太書生氣。（張譯時代版，第 361 頁）

高尚的孫中山看錯了人，把民國大總統一職讓給了袁世凱。（郁譯，第 324 頁）

郁飛沒有翻譯“foolishly”這一感情色彩明顯的修飾詞，張振玉譯為褒貶色彩不濃的詞彙“書生氣”。

上述翻譯細節典型地體現了意識形態對翻譯的操縱，除了譯者個人的價值取向，這種翻譯行為與譯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 三、漢譯文體特色

敘事結構的處理上，張振玉譯本採用章回體，每一章附一個小標題。這是清末民初以林紓為代表的譯界風尚，為了適應讀者的欣賞習慣與審美需求，將譯文變成中國傳統章回小說樣式，這種翻譯方式至“五四”新文學之後逐漸消失；汎思譯本沒有添加回目標題，但譯文採用明顯的章回體形式，故事以“話說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那天……”開始，第二章首句譯為“如今且說自從五月裡……”；郁飛譯本按照英文原著標出章目，未添加標題，譯文結構與原文對應；其他節譯本多是分三集譯述，各集內部不分章節。

句式表達方面，張譯本善於將英文中的複合句，譯成若干簡單句或詞組，甚至將主謂賓結構打亂，再以豐富多彩的譯筆重新組合，使譯文通順而富有文采，讀之有原創之感。這是符合林語堂的翻譯理念的，他曾批評鄭陀的譯文句子“冗長”、不順。林語堂的自譯作品算不上直譯，很注意根據讀者期待選擇翻譯靈活的方式，甚至譯著結合；相較之下，郁譯文則根據英文句法結構直譯。例如：

Illness brought her a strange restlessness and made her all the more eager to cling to life and squeeze from it the last drop of happiness. It made her envy health, but it also made her sentimental over a leaf that the wind had blown into her room. (p.484)

這種病使她特別敏感不安，她越發急切於抓住人生不放，似乎是要把人生的甜蜜幸福擠到最後



的一滴而後已。這病使她多麼羨慕人家的健康,也使她多愁善感,見一葉飄零,隨風入室,便愁緒滿懷,無以自解。(張譯名著版第2卷,第117頁)

疾病纏身使她想得更多,想得古怪,也使她更加抓緊人生,想從中擠出最後一滴幸福。她對於健康羨慕不已,也對偶然間被秋風吹進屋裡來的落葉傷感不已。(郁譯,第453頁)

原文只有兩句話,郁、張譯文將其分成若干短句。郁譯文依照原文結構直譯,句意清晰。張譯文更加突出富有才華的紅玉之多愁善感,“擠到最後一滴而後已”,“後已”二字,突出了病中的紅玉,像溺水者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般絕望又執着;從句 the wind had blown into her room 修飾 a leaf,但譯者將它們翻譯成兩個並列短句:“一葉飄零,隨風入室”。譯者根據語境,將 sentimental 一詞譯作“多愁善感”,並進一步引申出“愁緒滿懷,無以自解”。顯然,譯者發揮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葉知秋”,“悲秋”主題,以此深化紅玉病中愁腸百轉,難以釋懷。

從譯文語體來說,張譯本文白相間,比白話文簡練、優美,比古文清順易讀,基本達到林語堂要求的“達”、“美”效果;汎思譯文對普通讀者來說則略顯古奧,如:

這珊瑚今年有二十多歲。……不幸翌年既失所天又無所出,珊瑚因仍回到姚宅住下,迄今已有四年光景。但已柏舟自守,不獨面無愁痕且有恬然自足之態,而在男子面前,舉止大方,一點兒並不忸忸怩怩的。(《華僑評論》1946年第1卷第6期第38頁)

“柏舟自守”等詞語會使普通讀者感到生疏,近似晚清譯文風格。

此外,張振玉喜用四字詞語或成語,譯文讀起來富有韻律,優美動人。現將張、郁譯文比照:

It was of an inlaid Sung palace design, with curved roofs of towers reaching into the clouds, and wild geese flying against distant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nd palace women with high coiffures and low-necked dresses in the towers playing flutes or standing on a covered terrace looking at fish swimming amidst lotus flowers in the foreground.(p.134)

屏風上鑲嵌着宋朝的宮殿圖,閣樓飛脊,聳入雲漢,山巒遠列,秋雁橫空,樓中宮女,頭梳高髻,衣着低領,或坐而吹簫,或立畫廊觀魚戲蓮池。(張譯名著版,第154~155頁)

屏風上鑲嵌的是宋代宮廷圖景:一座座樓閣的飛簷曲頂聳入雲際,遠山背景前雁群橫列,樓閣中的仕女發髻高聳,衣衫低領,有的吹笛,有的站在樓台上觀賞池魚在荷花葉間游動的情景。(郁譯,第129頁)

郁飛譯成純正白話文,通順暢達;張譯文四字詞語的運用增強了節奏感,文采斐然。此外,小說中的主人公多生活在京津地區,人物對話多用京話。譯者是否用嫻熟的京話翻譯,林語堂是很在意的。當年他談到為何不自譯時,原因之一是對自己的“京話未敢自信”,並強調若自譯此書,必先將《紅樓夢》精讀三遍,因其白話最經典。林語堂批評鄭陀、應元傑譯文,“描繪口吻,可謂多半失敗,且常夾雜上海話”;<sup>④</sup>“惜未諳北京口語,……書中人物那種南腔北調的現代話,總不免失真”。<sup>⑤</sup>這方面的缺憾,當時的讀者認為譯者乃南方人之故。<sup>⑥</sup>譯文語言京味最濃的是汎思譯本,多用兒化音,注意地域方言。郁飛曾就讀於北京,張振玉自幼居北京多年,二人對京話並不陌生,但也未能達到信手拈來熟練運用的程度。郁譯文和張譯文注意使用北京方言,但不少譯詞並非地道的北京話。

#### 四、結語

當年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成為中國譯界的翻譯準則;林語堂在《論翻譯》一文中談到翻譯的標準為忠實、通順和美。從這個標準來看,上述節譯、譯述本顯

然不符合翻譯原則。越裔、沈沉等譯本有較大刪減，自然未能達到林語堂心目中善本的要求。但這些譯述本自有其存在價值，一些精彩的翻譯片段也曾得到林語堂的肯定，並為後來的張、郁譯文所參考。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譯述本頗受當時讀者歡迎，這從報刊刊發的讀者（評論家）反饋體現出來，覺得該小說“夠風趣”，重要的是扮演着特殊的社會使命，即“林語堂將這本書獻給前線抗戰的戰士”，“作者在本書中暗示一個民族永存不滅的意義”。<sup>⑤</sup>特殊時代賦予小說翻譯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該英文小說出版後，很快被譯成多國語言，1940年已有三種日譯文，“這些日譯本不僅都經過刪削，甚至還歪曲了作者的原意”。<sup>⑥</sup>中國譯界與讀者將翻譯該書與抗戰聯繫在一起，“林語堂的《瞬息京華》卻喚醒‘一個強大的民族，猶如一個巨人醒後奮發自為’，提醒一個老大民族返老還童”。<sup>⑦</sup>可見，在民族危殆年代，中國讀者對小說描繪的文化中國感興趣，更是對作品中的戰時中國產生共鳴。這些譯述本及時回應了讀者的閱讀期待，為他們帶來審美愉悅與精神支持。

張振玉與郁飛譯本增刪較小，“於完整性無損”。張譯文力求“達”“雅”，翻譯方式靈活多變，基本還原了原作風采。敘事結構採用章回體，這種復古形式明顯具有晚清民初譯事特徵。這種翻譯風格與張振玉的教育背景有關，他曾談到在輔仁大學讀書時，“已經看過不少商務印書館的林譯小說，與上海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就不知不覺中譯出了一篇文言文”。<sup>⑧</sup>他主張翻譯應該充分體現譯入語之美，譯文應有獨立之價值。<sup>⑨</sup>張振玉注意從詩詞曲賦、古典名著中體會用語之妙，並善於吸收具有生活氣息的生動話語，故能將古文的雅潔與現代漢語的通順融於一體，譯筆優美，句式靈活，字裡行間迴旋着一種自然節奏感，體現了他的歸化翻譯觀。作為後起之譯作，郁飛參照前人譯文與林語堂的評價，改正了前述譯本的諸多誤譯。他堅持“信”是翻譯的基本準則：“忠實表達原意便是應遵循的原則。”<sup>⑩</sup>郁譯本在詩文回譯、敘事結構、歷史文化再現等方面，明顯比其他譯本更忠實於原作。除了少數語句因拘泥於原作句式而略顯滯澀，郁譯文總體上更具現代翻譯特色，譯筆簡明達意。只是，在影視媒介、出版界、學術界的合力互動下，張譯文在傳播與接受方面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郁譯文。

① Lin Yutang, *Moment in Peking*,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9.

②③④⑤ 施建偉：《林語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43頁；第73頁；第93頁；第55頁。

③ 林語堂：《瞬息京華》，郁飛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783頁。

④ 林語堂原著、羅明改編：《京華煙雲》（四幕六場），上海：《小說月報》，1943年，第33~37期。

⑤ 《〈京華煙雲〉搬上銀幕舞台》，上海：《影迷週報》，1941年第6期。

⑥ 林語堂：《關於〈瞬息京華〉——給郁達夫的信》，郁飛譯：《瞬息京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785頁。

⑦ 卞之琳：《與周策縱談新詩格律信》，江弱水、青喬

編：《卞之琳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0頁。

⑧⑨ Lin Yutang, *Moment in Peking*, p.91, pp.113-114.

⑩ 林語堂：《瞬息京華》，林若年譯，廣西桂林：建國書局，1942年，10月再版；重慶：正風出版社，1943年。見周勇等主編：《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獻聯合目錄》（中），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

⑪ 林語堂：《瞬息京華》（上、中、下），越裔節述，上海：《世界傑作精華》，1940年3月號、4月號、5月號。

⑫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上、中、下），越裔譯，上海：《世界傑作精華》，1940年，第10~12期。

⑬⑭⑮⑯ 林語堂：《〈語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記》，陳子善編：《林語堂書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1頁；第333頁；第331頁；第331頁。

⑰ 周黎庵：《關於〈瞬息京華〉》，上海：《世界傑作精

華》，1940年3月號。

⑮徐培仁等譯著：《縮小了的巨著》（上、下編），（出版地不詳）大國書店，1946年。

⑯⑰林語堂：《瞬息京華》，譯者不詳，上海：正氣書局，1947年，第158頁；第158頁。

⑱林語堂：《瞬息京華》，汎思譯，《華僑評論》，1946年第6~10期，1947年13期。以上譯文分別為原作第一章和第二章開始部分的內容。

⑲林語堂：《瞬息京華》，汎思譯，《華僑評論》，1946年第6期。

⑳沈況：《寫在前面》，林語堂：《瞬息京華》，沈況譯，上海：上海歐風社，1941年。

㉑沈況：《節述後言》，林語堂：《瞬息京華》，沈況譯，上海：上海歐風社，1941年。

㉒林語堂：《京華煙雲》（下冊），鄭陀、應元傑譯，上海：春秋社，1941年，第999~1000頁。

㉓秦賢次、吳興文編：《〈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之一：林語堂卷》，未刊本，第31頁。

㉔林語堂：《關於〈京華煙雲〉》，廣西桂林：《宇宙風》，第113期（1942年4月）。

㉕④⑤⑤郁飛：《瞬息京華·譯者後記》，林語堂：《瞬息京華》，郁飛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781頁；第781頁；第781頁。

㉖馮亦代：《林語堂的〈瞬息京華〉》，《水滴石穿》，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134頁。

㉗萬平近：《談〈京華煙雲〉中譯本》，北京：《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2期。

㉘林語堂：《京華煙雲》，張振玉譯，台北：德華出版社，1977年。

㉙③⑨④⑤張振玉：《京華煙雲·譯者序（上）》，梅中泉主編：《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㉚曾於1991年、1992年、1994年三次再版。

㉛林語堂：《論翻譯》，吳曙天編：《翻譯論》，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

㉜郁達夫：《〈幾個偉大的作家〉譯者序引》，屠格涅夫

等撰：《幾個偉大的作家》，郁達夫譯，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林語堂：《論翻譯》，吳曙天編：《翻譯論》，上海：光華書局，1933年。

㉝徐許：《追思林語堂先生》，子通主編：《林語堂評說70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第145頁。

㉞郁達夫：《談翻譯及其他》，新加坡：《星洲日報星期刊·文藝》，1940年5月26日。

㉟郁飛：《瞬息京華·譯者後記》，林語堂：《瞬息京華》，郁飛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王任叔：《記郁達夫》，上海：《人世間》，2卷1期（1947年10月1日），2、3期合刊（1947年12月1日）。

㊱梅中泉主編：《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2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㊲林語堂：《生活的藝術》，黃嘉德譯，上海：西風社，1941年，第265頁。

㊳梅中泉：《編輯需要膽識——寫在林語堂〈京華煙雲〉出版之後》，北京：《出版工作》，1988年第12期。

㊴林語堂：《談鄭譯〈瞬息京華〉》，廣西桂林：《宇宙風》，第113期（1942年4月）。

㊵程心粉：《評林語堂的〈瞬息京華〉》，北平：《中國文藝》，1940年第3卷第3期。

㊶全增嘏：《瞬息京華》，上海：《西洋文學》，1940年第1期。

㊷密勒氏評論報：《瞬息京華》，上海：《宇宙風》（乙刊），1940年第21期。

㊸張振玉：《憶吾師李霽野先生》，《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131頁。

㊹參見張振玉：《譯學概論》，台中：中台印刷廠，1966年。

作者簡介：孔令雲，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南京 210044

[責任編輯 桑海]